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

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

**Modern "Businessmen
Tribe" in Fujie**

陶 庆/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

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
合法化危机

**Modern "Businessmen
Tribe" in Fujie**

陶 庆/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
化危机 / 陶庆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ISBN 978 - 7 - 80230 - 480 - 2

I. 福... II. 陶... III. 社会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898 号

·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
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
——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

著 者 / 陶 庆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负责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谢 炜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8 字 数 / 44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480 - 2/D · 117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陶庆 男，安徽省宁国市人，1965年12月出生。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双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文明与宪政”；“民间商会与公民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与政治发展”。

独立主持部级项目：“民间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路径选择”、“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私营企业主行动选择研究”和“宪政人类学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独立发表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文史哲》、《求是学刊》等发表（含译文）4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1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转载转摘。

独立获得荣誉：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报告《福衍的现代“商人部落”》“优秀”等级；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1~2002学年度和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2~2003学年度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获安徽师范大学第二届华藏（中国台湾）科研奖。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 能
李建新	朱晓阳	邱泽奇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本专著系：

1. 安庆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基金出版资助成果
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民间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05JA840001）成果
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社团组织研究”（02JAZJD840002）子课题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1985年和1987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始终在他直接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无论在选定命题、提出破题思路、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和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重大问题，积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为在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



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并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自我所承担“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自1996~2005年共出版四十余卷。今后这一个系列的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在各部门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和《社会学人类学译丛》两套系列丛书，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之外，我们社会学界的一些同人与华夏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我们希望，以上这几套丛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同时又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5年3月

序 一

高丙中*

一个商会，从国家之外的“部落”，转变为国家之中的一个团体；从远离国家的自组织，到与国家关系密切、互动频繁的合法社团。陶庆博士的这部政治人类学著作由故事和对话连缀而成，我从中读到的是一个地方商会的生命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与国家订立“新约”的关系史。要这样来理解，我们还得回到涂尔干开创的学术传统里。

在涂尔干（1858 ~ 1917）的时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分化（劳动分工、阶级分化）是讨论社会进步与秩序和道德问题的学者所关注的突出事实。在他之前，从秩序和道德的正反两面看待社会分化的观点都存在，^①而涂尔干的进入方式体现着他自己对问题的关怀。在他生活的时代，欧洲已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深陷在工业社会的现代危机之中。他身处矛盾重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望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失范的根源，诊治社会疾病。他的《社会分工论》直接证明的是社会新的分化（过程）能够产生新的整合（机制）。它在阅读上起到了在众多对现代社会的失望中建立关于社会发展的信心的效果。他正面（乐观）

* 北京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① Hans - Peter Müller, 1994,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Organic Solidarity: The Division of Labor Revisited", in *Sociological Forum*, Vol. 9, No. 1, pp. 73 - 86.



看待当下社会的技巧是强调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复杂社会与作为个人幸福指标的人格的发展和作为公共规范的社会道德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的正面的联系。他的分析让世人相信，在新型的社会里，个人更有机会让人格得到更自由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不必然造成社会的无序，而且恰恰相反，必然让社会更有机会达成公共规范或他自己爱用的“社会道德”。

他自己在开篇的地方定位说，“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要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越加紧密？”^① 换句话说，他直接研究的是，在一个专业化（个人多样化）日趋细密或分化（社会复杂化）日益突出的社会，如何才可以建立社会秩序（包括社会道德或公共规范）？

涂尔干把分工作为观察的路径来描绘复杂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一个充满异质差异的社会当中，个人的完整有赖于他人的存在，个体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他在抽象的层次上思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正面的外在联系和内在态度，涉及规则、制度、交换等外在的方面，也涉及意识、观念、价值、情感等内在的方面，他喜欢采用的相关术语主要是“社会道德”、“社会团结”，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的这两个术语实际上表述着社会之成为集体的诸要素的多个方面。他用道德表述的是社会秩序、公共规范的内在化，他用团结表述的是集体内部成员相互之间的共同意识（关于他人和社会的意象和观念）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趋势。

现代状况下的社会变迁必然牵涉一些规范的放弃和另一些规范的确立，造成身处其中的人们的道德问题或团结问题。在涂尔

①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11页，2000（1893）。



干的思考中，道德准则是内在于社会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个体良知的表现现象，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种社会生活消失了，那么内在于其中的道德生活终究也会随之消失，因为它再也没有了相应的客体。道德的形成、转化和维持皆要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中寻找原因。所谓道德危机，往往是适应的危机，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它的社会规范和关于它的观念尚不协调的问题。就涂尔干的一个中心论题来说，分工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更重要的是，分工造成的新社会结构产生了它特有的道德价值。“总而言之，分工不仅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成了道德秩序的基础。”^①一方面，个人由此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依赖关系，因为他必须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的合作才能发挥作用、达到目标，他也明白个人意象的完整在于他人意象的参与；另一方面，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拥有了自己不同于以前的行动范围和自由度，他的人格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这就是他所描述的转型成功的复杂社会：更自由的个人与更团结的社会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他把这种条件下的社会团结称为“有机团结”，与传统时代的“机械团结”相区别。他关于两种社会团结的说法可以分别从历史叙述和类型描述来阅读。

历史地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机械团结被有机团结所代替。在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模式当中，社会之成为集体生活，具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是个人意识的相似性，二是社会劳动分工。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不同的社会类型。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小地方、小共同体内，因意识的高度同质性而凝聚在一起，形成大社会中一个个内聚性很强的环节。这就是传统的环节社会，人们在地方上借助人际互动产生较

①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359页，2000（1893）。



强的社会团结，可是这种团结并不能推及整个社会，因为人们在这个范围没有充分的现实联系，只是单纯缘于意识的相似性而具备一定程度的团结。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分工的发达使社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被紧密地组织起来，新的组织结构替代原来的环节结构，使以往在“环节”之间相互分离的个人也日渐在实际生活中被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新型的组织社会，在其中，劳动的分工程度与社会凝聚的动力密度或道德密度是正比关系。

在类型上，“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简明地说，机械团结是社会发挥功能所必需的，但从个人自由的立场来说对个人是压抑性的。机械团结源于社会成员在意识上的相似性，在近似铁板一块的集体意识的笼罩下，个人的个性、人格没有发育的机会，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在机械团结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在个人与社会所介入的拉力赛中，离心力与向心力呈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团结的发展与个人人格的发展是逆向而行的，团结发展到极致状态时个性就丧失殆尽。恰恰相反，有机团结是社会功能和个人自由相得益彰的状态。有机团结源于社会成员在活动层面的相关性（互补性）和意识层面的相互性（共生性），因为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交换使行动者在功能上互补，在意象上共生。“交换就是这种依赖关系的外在阐释，对其内在和深层状态的外在表现。正因为这种状态是持续的，所以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象系统，其主要的功能就是连续性，这正是交换所缺少的属性。我自己的意象与另一个使我完善的人的意象是不可分离的，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意象不断与我的意象相互融合，更是因为这种意象就是对我的意象自然而然的完成。这样，它就成了我们意识连续的、恒定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缺少不了它，甚至千方百计地强化它。”^①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①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5页，2000（1893）。



是这样，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集体意识不再是强制性的，不再阻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关于个体尊严、专业分化、公平正义和职业道德的新的一致性成为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正面结合的基础。^①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初始文本中主要从逻辑上论证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分化和整合是可以兼容、并存的，并且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指出了已经失灵的机械团结正被新型的有机团结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那么，在现实中，谁是有机团结的承载者呢？他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的序言（1902）中回答是职业群体、法人团体，并就此问题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后来被结集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给予了进一步的发挥。

涂尔干把原先的“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改换成“个人、次级群体与国家”的结构，在社会中的团体、群体（如职业群体、法人团体）身上见证有机团结。他说，社会不等于乌合之众，次级群体是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②。他提到的次级群体主要是法人团体、职业群体。

①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44～247页，2000（1893）。笔者注：涂尔干并不回避分工所带来的与团结截然不同的效果，如反常形式的、强制的分工使个体不能凭借其能力获得相应的工作和缺乏协作，失范的分工表现为工商业危机、破产和劳资冲突等。这是适应过去的社会结构但在当时看来却已经不公平的规则所造成的。涂尔干认为，这是由于在急剧变化的时期社会机体的各部分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而缺乏相互的调适（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320页）；尽管如此，他相信，如果分工是自发的和自由的，它就会形成团结（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336页）。

②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40页，2000（1893）。



次级群体承载着有机团结，是因为它们在形成与运行中是与规范、道德相伴随的。按照他的说法，分工意味着与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相伴随；个人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集体的角色就在于它主动积极地涉入了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规范既能保证个人自由又能避免不当的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失范状态的治理，也是必须先建立次级群体，然后建立相应的规范体系。次级群体是把原子个体和权力国家进行连接的道德中介，它们对于将个人凝结为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道德共同体是相当关键的。次级群体之所以必不可少，并非在于它们作为功利组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它们对道德所产生的切实影响。^① 道德准则要体现在具体的次级群体的层面或者说体现在组织实体当中。

次级群体一方面是个人与国家的联结中介，另一方面，它们与国家相互制约而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保证以此为基础的有机团结能够真正实现。他说，只有通过国家，个人才能免于次级群体的压制；只有借助次级群体，个人才能免于国家的暴政。两者的同时存在是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的根本条件。^② 个人在这里是作为公民出现的，这就必然意味着个人在国家内享有广泛的选择机会和普遍的权利，不可被特定的次级群体所剥夺。只有国家的介入，才能战胜次级群体的特殊主义。^③ 国家的这种作用可以防止次级群体内部的团结不蜕化为环节社会的机械团结，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可以选择多种次级群体，相应的，各种群体都不能独占

①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第41页，2000（1893）。

②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69页，2001（1958）。

③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1页，2001（1958）。



任何公民。^①

涂尔干描述的社会及其时代与当代中国固然是不同的，但是在一个抽象的层次，他的理论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演进又是高度契合的。在大集体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通过隶属于特定的单位和社队而归属于党和国家。对于隶属于这个基层组织的事实，既不是我们事先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我们容易选择改变的。在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结构中，一种秩序感很强的集体意识和道德意识在民众中建立起来。近30年的改革开放，普通的个人获得了多方面的、多种程度的自由，他们从旧结构中走出来，利用获得的自由探索新的社会联系方式。在这期间，旧秩序感的丧失引起了社会的焦虑，管理阶层的许多人对新秩序的建立缺乏信心，总是以不当的方式对社会的自组织机制进行过度干预。这自然又造成了许多的社会困扰。在我们学界已经有了大量对于形形色色的干预的批评之后，我以为，以涂尔干式的积极心态和正面眼光发现成功的案例，并使案例成为公共经验知识，是我们对一个开放社会的自组织具有普遍信心的基础工作。有了普遍的信心，我们才能在社会中形成“新约”，按照新的预期、新的规则发生社会互动。

民间商会，行业组织，乃至所有社会团体，都是个人自愿结社的表现形式。它们作为开放社会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衔接方式，体现着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它借助公民身份的观念，预设每个个人是平等的和自由行使意志的。它又仰赖公民社会的约定建立实现个人意愿的机制：个人通过自愿组织向社会表达利益，利用自愿组织代表自己，推行自己的价值与追求。这种机制和这种过程恰恰也是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陶庆博士关于

① 高丙中，“社团合作与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福街现代商人合群结社的政治人类学民族志故事已经非常生动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人们因为地缘、业缘而结成中间组织，一方面体验自治、自律、自得其乐的团体生活，一方面集中表达诉求，并且同时分担一定的政府责任，结果是皆大欢喜。

是为序。

2006年9月18日

于北大蓝旗营

序二 中国民间商会的改革是 绕不过去的

保育钧*

民间商会的兴起与发展涉及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陶庆博士的这本专著，从政治人类学“讲故事”的学术角度，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南方某沿海开放城市著名商业街的现代商人群体，经过长达八年的民间自治活动，最终获得合法登记这一传奇而动人的事件。著作中演绎出的三十七个“故事”虽是人类学方面的个案经验，但反映了转型期中国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民间商会的改革向何处去？这个课题之所以重大，在于它从根本上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个课题之所以不能回避，在于它是我国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结”。这个“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兴阶层的利益表达绕不过去。中国民间商会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正如执政党如何加强执政能力、政府如何转变职能等改革也是绕不过去一样。商会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只要真正地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搞商会，这个认识正在逐步趋向一致。根据是什么？是党中央的几次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

我记得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9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

*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